

萬象小報

近代中國城市的文化、社會與政治

連玲玲 主編



萬象小報

近代中國城市的文化、社會與政治

連玲玲 主編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102年

萬象小報：近代中國城市的文化、社會與政治 / 連玲玲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中研院近代史所，民102.08

面；公分

ISBN 978-986-03-7758-3 (平裝)

1. 中國報業史 2. 娛樂業 3. 上海市

890.92

10201618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萬象小報

近代中國城市的文化、社會與政治

主 編／連玲玲

出 版 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發 行 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臺北市南港區 (11529) 研究院路 2 段 130 號

電話：(02)2782-4166

劃撥帳號／1034172-5

戶 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訂 購 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發行室

印 刷／長達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市西園路二段 50 巷 4 弄 21 號

電話：(02)2304-0488

初 版／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定 價／新臺幣 400 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78-986-03-7758-3 (平裝)

GPN 1010201642

目 錄

導論：從小報看近代中國城市	連玲玲	1
---------------	-----	---

文化建構

環球樂園導覽：上海遊戲場小報和近代 中國城市娛樂文化的創發	葉凱蒂	25
出版也是娛樂事業：民國上海的遊戲場報	連玲玲	65
戰後初期上海的特殊性別現象 ——以「方型週刊」為觀察對象（1945-47）	楊佳嫻	107

社會行動

吳趼人：矛盾的小報作家	汪 涓	159
筆記傳統與現代媒體：包天笑在《晶報》 的撰述活動	孫慧敏	191

阮玲玉「新女性」事件與上海新聞界 ——兼論小報在其中的作用	高郁雅	227
----------------------------------	-----	-----

政治運作

議政與馴化 ——上海小報發展史的一個側面	林美莉	275
細審新聞記事：《越華報》與廣州日常生活（1927-1938）	包利威	335
從地方報看江南市鎮社會在1920年代的 嬗變：以新南社的活動為中心	佐藤仁史	367
作者簡介		409
人名索引		411

導論

從小報看近代中國城市

連玲玲

2011年7月10日，英國歷史最悠久的小報《世界新聞報》（*News of the World*）宣佈停刊，起因是侵犯隱私的竊聽風暴。該報向以揭發政客名流的醜聞著稱，記者為獲取一手消息，竊聽手機留言；一般相信，這種罔顧新聞道德的做法，得到報社高層的默許及鼓勵。經警方調查發現，該報竊聽的對象不止於王室成員、政壇人士或體育明星，還包括警方、軍方人士，甚至犯罪受害者，影響所及超過4,000人。¹這樁事件使得從不報導世界新聞的《世界新聞報》登上全世界各大報紙頭版，也引來不少「媒體自律」的議論。美國《紐約時報》批評該報「降低報業標準」、「習慣性地違法」，甚至犧牲了報業的公正客觀性。²

¹ 關於《世界新聞報》竊聽事件經過，見“News of the World to Close amid Hacking Scandal,” *BBC News*, July 7, 2011. Retrieved from <http://www.bbc.co.uk/news/uk-14070733> (March 20, 2012).

² Joe Nocera, “The Tables Are Turned on Murdoch,”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18, 2011. Retrieved from <http://www.nytimes.com/2011/07/19/opinion/19nocera.html?ref=opinion> (January 3, 2012). Alexander Abad-Santos, “The New York Times Questions the Journal’s Integrity,” *Atlantic Wire*, July 19, 2011. Retrieved from <http://www.theatlanticwire.com/na->

其實小報以賄賂、竊聽等不正當手段取得新聞材料，或者報導來源不確實的街談巷議，並不是新鮮事；從十九世紀小報出現以來，類似《紐約時報》的批評從不間斷。1833年針對平民大眾所創辦的《紐約太陽報》（*The New York Sun*）被時人批評為「低俗、廉價、煽情」，「根本不知新聞為何物」。³ 英語世界還發明了「蚊子報」（*mosquito newspapers*）一詞來形容這類報紙：它們出現在陰暗角落，發出擾人的嗡嗡聲，一有機會就發動攻擊，不但令人奇癢難忍，還會傳染「黃熱」等疾病。⁴ 時至二十世紀，情況似乎更為嚴重：1998年美國的媒體專業期刊《哥倫比亞新聞評論》（*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舉行一次大型會議，邀集250位記者、報社主管及新聞評論人討論美國媒體的「危機」，重點放在小報的興起及新聞的瑣碎化。這些「主流」媒體人認為小報偏好腥羶聳動的新聞內容，只對政治醜聞有興趣，缺乏對政治議題的真正關懷，已經嚴重損害新聞媒體作為輿論場域的價值，甚至對民主憲政構成潛在的威脅。⁵

不單是英美國家，近代媒體發展相對較晚的中國，也同樣出現「小報現象」。中國最早的小報《遊戲報》創刊於1897年，比上海最有影響力的《申報》晚了25年，由於內容趣味，相當受到讀者歡迎，此後各類小報開始大行其道。1927年，一位《北洋畫報》的作

tional/2011/07/new-york-times-vs-wall-street-journal/40134/ (January 3, 2012).

³ Henrik Ornebring and Anna Maria Jonsson, "Tabloid Journalism and the Public Sphere: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Tabloid Journalism," *Journalism Studies* 5:3 (2004), p. 288.

⁴ "Mosquito Newspapers," *Grey River Argus*, vol. 9, Issue 742 (Oct. 20, 1870), p. 2. Retrieved from <http://paperspast.natlib.govt.nz/cgi-bin/paperspast?a=d&d=GRA18701020.2.14&cl=CL2.1870.10&e=-----10-1----0--> (December 1, 2012).

⁵ Colin Sparks, "Introduction: The Panic over Tabloid News," in Colin Sparks and John Tulloch eds., *Tabloid Tales: Global Debates over Media Standard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0), p. 1.

者「天哭」便對民國以來的小報有如下的評論：

比年以來，小報疊出，群相效仿，大有風起雲湧不可遏止之勢。考其意，不過垂涎《晶報》銷路宏大，由是彼出一張，此出一張。在民國九、十年間，海上本亦有小報潮之說，惟內容專載文藝小品而已。迄至客歲，小報內容，一轉而為秘史密聞，對於奸盜邪淫之事，備載綦詳，描寫齷齪污史，更形露骨。冶容誨淫，古人恥之，今人非但不掩藏之，且極狀而筆之報端。社會道德不良，此等小報，是亦有過焉。更有言者，今之小報命名奇特，實可一哂，信手拈來，即成報名。如司的克出而復有摩托卡，福爾摩斯羅賓漢別皆取外人之名，彼意謂名奇，即可炫人，實則自暴其拙耳。豈中國字典及古人中，無字無人可取為名，而必欲以西文西人代之耶。此外如火光花笑……等報，全屬毫無根據，胡鬧而已。實則此輩，無非好出風頭，欲獵虛名，是以初識之無，即便搖筆伸紙。辦報之熱，有如中狂，信口雌黃，大肆謾罵，是其故技。此外如敲竹槓、施拆白等事，亦在在皆是。雖不能一筆掩盡斯中無一人忠直，第同流合污，亦成近墨者黑矣。⁶

「天哭」不僅批評上海小報內容低俗露骨，也認為主事者心態殊為可議：此輩辦報，或為分食小報市場，或為博取主編虛名。尤有甚者，許多小報喜用西文西人作為報名，以吸引讀者。在「天哭」眼中，小報內容不但有損社會道德，也違背「中國文化至上」的立場。

⁶ 天哭，〈談小報〉，《北洋畫報》，期54（1927年1月12日），頁3。

表面上看來，「天哭」和《紐約時報》及《哥倫比亞新聞評論》的記者一樣，均把小報定位為專門挖掘名人隱私的「八卦報刊」，不過這篇評論提到 1920 年代初期的「小報潮」乃以文藝小品為主要內容，意味著民國小報歷經一番變化。1930 年代中央社記者盧祺新也注意到民國時期小報的發展趨勢，並認為國民政府的新聞政策，有效打擊「小報歪風」。同時 1930 年代讀者培養不同的新聞品味，開始摒棄小報的低級趣味，轉向較嚴肅的政治課題，這使小報隨之調整內容。⁷但小報究竟是什麼？它與大報有何區隔？根據時人高新一的觀察，小報之所以異於大報，一是篇幅大小：一般大報尺寸為四開，《申報》、《新聞報》等全國性報紙可以多達 6 張 24 版；小報則多為八開，每期僅 1 張 4 版。版面大小也決定其內容多寡，正如作者的生動比喻：「大報猶如百貨商店，小報等於街上的小鋪子」。其次，大小報的新聞記載方式亦明顯不同，大報較為嚴正，小報則以遊戲態度處理。這也影響到讀者的讀報目的與態度：讀大報是為求知，看小報意在消遣。正因為一般人閱讀小報是為了消磨時光，所以長期訂戶較少，多半是「隨便購買，或者在外出等電車汽車的時候，或者用以為公餘飯後的消遣」。⁸從以上比較可以看出，小報的「小」，表現在三方面：紙張實際尺寸及信息量，文字風格與表達態度，以及內容的社會影響力。

高新一的觀察大致上符合時人對上海小報的認知，不過也有例外情形，如被報販歸類為小報的《中華日報》，篇幅與一般大報無異；

⁷ David Chi-Hsin Lu, "Gems from the Mosquito Press," *T'ien Hsia Monthly* 1:1 (January 1938), pp. 7-17. Retrieved from http://www.chinaheritagequarterly.org/tien-hsia.php?searchterm=023_mosquito.inc&issue=023 (December 1, 2012).

⁸ 高新一，〈上海的小報〉，《社會與教育》4：14（1932 年 8 月 27 日），頁 209-210。

前述的中國小報鼻祖《游戲報》，雖詳細報導菊壇及花界動態，但主編李伯元仍高舉啟蒙大旗，欲「假游戲之說，以隱寓勸懲……或托諸寓言，或涉諸諷詠，無非欲喚醒痴愚，破除煩惱，意取其淺，言取其俚，使農工商賈、婦人豎子皆得而觀之，庶知天地間之千態萬狀，真一游戲之局也」。⁹《立報》篇幅雖小，卻以國際及國內要聞為重點，可說是「大報化小報」的典型。因此民國時期小報的複雜程度，遠非八卦報刊可比擬。

儘管如此，由於多數小報慣用幽默諷刺的書寫筆調，選取題材亦以趣味為原則，再加上「天哭」所大加撻伐的「橫式報」曾風行一時，¹⁰使一般讀者無法嚴肅地看待小報，這種媒體也就難登學術殿堂。以民國報刊史為例，既有論著絕大多數以《申報》、《大公報》等「大報」為研究對象。¹¹1928年商務印書館所出版的《中國報學史》，是當時大學新聞科系學生必讀的教科書，對近代中國的新聞教育影響甚鉅。在長達384頁的篇幅裡，關於小報的介紹，只有短短4行文字說明，再加上幾幅報影。顯然前輩學者認為這類「道聽塗說，描寫逾分，不免誨淫誨盜之譏」¹²的小報，不適合作為歷史研究的題材。

⁹ 〈論游戲報之本意〉，《游戲報》，1897年8月25日。

¹⁰ 這類報紙風行於1925至1929年間，以橫式排版，內容非裸即賭，被稱為小報界的「黃色濁流」。李楠，《晚清、民國時期上海小報研究：一種綜合的文化、文學考察》（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43。

¹¹ 以臺灣為例，以民國時期報紙為研究對象的碩博士論文共22篇，《申報》占7篇，《大公報》4篇。當然，研究生選題與資料取得方便性有關係，《申報》、《大公報》是較早重印、並為臺灣各大圖書館所收藏的報紙，因此研究成果較豐。暨南大學開始收藏晚清、民國小報後，陸續有3位研究生以《游戲報》和《世界繁華報》為論文題目。

¹²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28），頁262-263。

然而小報真的只能作為茶餘飯後的談資，毫無歷史重要性與研究價值嗎？以下幾個社會現實與理論概念的面向，也許有助於我們重新思考小報的意義。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小報的發行量之大，堪與大報相媲美。1899年日人內藤湖南（1866-1934）遊歷中國時，注意到上海中英文報紙的發行量均不大，《申報》約7,000份，《新聞報》及《中外日報》在2-3,000份之間，《滬報》在1,000份左右，唯獨《遊戲報》發行萬份以上。¹³時至民國時期，某些小報仍相當受讀者歡迎，《時報》總編輯戈公振（1890-1935）便觀察到，北京的《春生紅》及上海的《晶報》均極暢銷，不亞於大報。¹⁴根據《申報年鑑》的統計，1931年發行量超過5萬份的報紙只有《申報》、《新聞報》和《時事新報》，而《大公報》、《時報》及《益世報》則為3.5萬份。¹⁵同時期的小報《晶報》及《金剛鑽》，每期發行量各達3萬及1.5萬份，超過多數的大報。¹⁶此外，從小報發行的種類，亦可窺其端倪。上海圖書館館藏小報在千種以上；文人之所以願意投入資金、時間、精力於小報，無非是相中小報的市場潛力。這也意味著小報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是上海報刊產業的重要部分。因此要評估媒體的社會功能，不應忽視小報的角色。

其次，小報作為媒體產業的一部分，幫助我們更細緻地了解報業生態。正如同一般企業史，媒體研究者多半把焦點放在資本額大、發行時間長的大報，也因此報刊往往被稱為「印刷資本主義」（print

¹³ 內藤湖南著，吳衛峰譯，《燕山楚水》（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89。

¹⁴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頁262。

¹⁵ 申報年鑑社編，《申報年鑑》（上海：申報館，1933），頁R2-3。

¹⁶ 洪煜，《近代上海小報與市民文化研究（1897-1937）》（上海：上海書店，2007），頁323。

capitalism) 的典型，例如《申報》及《新聞報》的創辦人均將報紙視為「企業」，採公司組織並向銀行舉債等現代經營方式。¹⁷ 然而許多報刊並沒有資本主義機制為後盾，尤其是旋起旋滅的小報，往往只是幾個文人一時興起合資所辦的同仁刊物，經費不足便無疾而終。個別的「短命」報紙也許對於整體報業無甚影響，但小報的發行構成特殊的報業現象。換言之，小報為報業的生產、銷售與流通，提供了有別於大報的模式，有助於我們較全面地理解報業的運作方式。

第三，「主流」報刊出現「小報化」的傾向，顯示小報在媒體價值觀的塑造上，發揮相當的作用。1928年3月上海發生一樁殉情案，引起各報的關注，爭相報導女主角的自殺緣由及經過，並藉此事件辯論戀愛與性道德等當時最熱門的話題。根據顧德曼（Bryna Goodman）對這個事件的研究，熱衷這條新聞者不只是所謂的「小報」，也包括名列滬上四大報紙的《時報》、《時事新報》，以及國民黨機關報《民國日報》，其中《時報》記者鏗而不捨地追蹤並披露男女主角的情書，將其私生活完全暴露在公眾眼前，正是「大報小報化」的表現。¹⁸ 小報的發行量大增，甚至超過大報，或許還可以解釋成讀者品味所致；但如果大報走向「小報化」，小報就成了定義媒體價值的重要環節，報刊研究也就無法持續對小報視而不見。

第四，小報雖一向被認為是大眾文化的一部分，卻是各個社會階層的接觸點。中下階層讀者藉著小報對名人祕辛的披露，得以一窺上

¹⁷ 參閱 Barbara Mittler, *A Newspaper for China? Power, Identity, and Change in Shanghai's New Media, 1872-1912*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Timothy B. Weston, "Minding the Newspaper Busines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Journalism in 1920s China."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31:2 (April 2006), pp. 4-31.

¹⁸ 顧德曼（Bryna Goodman），〈向公眾呼籲：1920年代中國報紙對情感的展示和評判〉，《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14（2006年12月），頁179-204。

層社會的風華。儘管不少知識分子嚴厲批判小報內容的浮誇，甚至宣稱拒看小報，但仍有不少社會菁英把小報列為閱讀範圍。民國政要譚延闓，即為《晶報》的忠實讀者，根據其日記所載，1922至1927年因職務調動曾赴廣州、湖南、武漢、南京等地，但只要有機會，便向友人借閱《晶報》。¹⁹ 因此，小報可謂跨越階級界線的文化產品，提供一個觀察城市讀者（urban readership）的窗口。

第五，小報促使我們重新建構（或至少擴充）報刊研究的理論框架。近代報刊理論中影響最深的是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提出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概念，他認為十七、八世紀歐洲社會出現相當有活力的「公共領域」，包括實質空間（如咖啡店）及抽象空間（如報刊），人們在其間進行知識及社會議題的辯論。由於這個領域的「公共性」，參與討論者來自各種社會階級，這使得平民百姓也有機會發表自己的意見。哈伯瑪斯提出「公共領域」概念時，主要著眼於它對政治的影響力，亦即證明法國大革命之前，批判性的社會力已然形成，並且為這場鋪天蓋地的政治革命提供學理及民意的正當性。這個觀點後來被學者用來描述及評估報刊在公眾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因此既有研究多半將報刊視為具政治意涵的公共領域。²⁰ 不過報刊種類眾多，出版目的各異，很難視之為性質一致的公共領域；針對這一點，弗拉塞（Nancy Fraser）提出「多元」（multiple）或「另類」（alternative）公共領域的概念，她認為允許「另類公共領域」的

¹⁹ 〈譚延闓日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數位資料庫，<http://dbj.sinica.edu.tw:8080/handy/index>（2012年3月7日搜尋）。

²⁰ 在中國史方面，典型的例子為高郁雅，《北方報紙輿論對北伐之反應：以天津大公報、北京晨報為代表的探討》（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9）。Joan Judge, *Print and Politics: Shibao and the Culture of 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存在，較能促進民主參與並開啟公共辯論，尤其像女性、工人、有色人種等弱勢團體，更有必要創造不同於主流社會的公共言論，以捍衛其獨特的利益與需要。²¹某種程度來說，小報所形構的乃不同於主流媒體的「另類公共領域」，有特定的參與者，獨特的關懷議題，以及特有的討論方式。當然，把小報視為「另類公共領域」並不意味著它與大報是兩個壁壘分明的世界，某些文人的確同時為大報及小報撰稿；但區別這兩種言論場域，有助於我們擴大並深入思考「公共領域」的內涵：大報與小報在公共領域的建構上各有何角色？它們是單一公共領域的多重面貌，還是分屬於不同的公共領域？它們彼此間又有何關連性？要回答這些問題，就必須把小報納入報刊研究的範圍。

問題是，我們要如何研究小報？小報研究者所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如何從這些零碎片斷的新聞資料中，說一個有趣又富有歷史意義的故事。事實上，最近 10 年已經有年輕學者陸續投入這個領域，尤其是臺灣及中國大陸的碩、博士生以小報為論文題目，顯示他們對新材料及新議題的興趣與探索。²²其中，李楠及洪煜修改自博士論文的專書，可以提供我們思考的起點。李楠的《晚清、民國時期上海小報研究：一種綜合的文化、文學考察》（2005），把小報定位為「市民文化」的載體，透過對小報作者及小報內容的分析，探討「市民文化」的形

²¹ Nancy Fraser, "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Actually Existing Democracy," in Craig Calhoun ed.,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2), pp. 122-123.

²² 這方面臺灣小報的研究發展較早，2000 年即有學生以《風月報》為研究對象，不過可能由於臺灣發行的的小報較少，目前研究成果集中在《三六九小報》（9 篇）及《風月報》（4 篇）。另有學生研究上海出刊的《遊戲報》（2 篇）和《世界繁華報》（1 篇）。中國大陸方面，由於沒有完整的碩博士論文資料庫，較難全面地統計小報研究的論文數。

態及其形塑過程。作者以通俗文學史的角度詮釋小報，認為晚清到 1930 年代前半的上海小報乃由「鴛鴦蝴蝶派一統天下」，可以說，小報是鴛鴦蝴蝶文學最主要的再現場域，因此她把小報作者定位為「文人」而非「記者」，小報內容則「文學」多過「新聞」。和其它報刊研究者一樣，李楠也用「公共領域」來理解小報，但她所謂的「平民公共領域」與哈伯瑪斯及弗拉塞的定義不甚相同：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是資產階級爭取及運作政治權力的所在，弗拉塞則視之為創造及維繫文化認同的場域，不論資產階級或弱勢團體內的菁英，都是議題的主導者，然而李楠強調小報「平民化」的趨向。她認為「早期小報的舊文人氣息很濃，不管是文人墨客間的詩詞酬唱，還是評點時事的『首論』，都是士大夫自說自話，與市民的現實關懷相距甚遠。中後期的小報漸漸將注意力轉向普通市民，與市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內容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換句話說，李楠的「平民公共領域」是以「市民」為中心，小報文人必須向市民文化「投誠」。²³ 李楠對小報「平民化」的觀察大致不錯，不過她並沒有解釋這個公共領域的目的為何。儘管哈伯瑪斯與弗拉塞揭示公共領域的不同主張，但兩者咸認為公共領域是凝聚共識的言論空間；李楠的「平民公共領域」則呈現日常生活的紛雜與瑣碎，不但使「市民階級」顯得模糊而無邊界，也難以斷定小報文人是否具有獨特的群體認同——這可能是李楠所採取的研究策略所致：她把小報視為通俗文學的表達形式，卻未注意到小報所具備不同於小說散文集的傳媒特性；而她著重於文本的內容分析，忽略了文本的生產及傳播過程，包括小報文人的關係網絡在其間扮演的角色，這也容易低估小報文人設定議題及主導討論的能力。

²³ 李楠，《晚清、民國時期上海小報研究》，頁 134。

相較於李楠的文學史視角，洪煜的《近代上海小報與市民文化研究（1897-1937）》則是典型的媒體史研究。作者將小報放在近代上海娛樂業及報刊業的脈絡下進行考察，對小報的發行、流通及行銷做較細緻的討論，特別分析小報讀者及小報文人的群體特徵。和李楠一樣，洪煜也把小報視為市民文化的窗口，不過他所謂的「市民」似乎包含更多的社會階層：舉凡政府要員、上海聞人、文人作家、教師學生、店職員工等均為小報的讀者，其生活樣態也是小報的主題內容。此外，洪煜還注意到小報文人的複雜角色：對李楠而言，小報文人是資訊傳播者，小報像一面鏡子，映照出「市民社會」的真實面貌。洪煜則認為，小報文人除了是「有聞必錄」的新聞播報員，也是社會公德的監督及引導者，更是隱寓勸懲的政治評論家。例如小報文人雖以揭發社會黑幕為能事，且描寫大膽辛辣，但對於婦女時尚多半採取保守態度，嚴厲批評摩登女性一味追求流行。換言之，小報不僅是市民社會的現實反映，也是市民社會的啟蒙教材。因此，洪煜雖把小報稱為「文化公共空間」，但仍強調其輿論監督的功能：

由於它們〔小報〕經營的商業性、私人化及報人經濟的自由獨立，加上政治環境的特殊性，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能夠承擔起公共空間的職能，對於國家政治以及公共事物的批判具有公正、客觀性。儘管它們所表達的對政治、社會、公共事務的批判是「邊緣型」的批判模式，而且在很多情況下也沒有形成公眾輿論一類的事物。然而正是由於小報這一市民文化空間的存在和發展，在國家權力膨脹、上海大報處於失語境地時，它們發揮了皮里陽秋的滑稽敘事風格，『言大報所不敢言，登大報所不敢登』。在新聞言論壁壘森嚴的時代，

發揮了較多的社會輿論監督功能，使小報的社會地位抬升。

『大報看廣告，小報看新聞』即是對小報社會作用的最好評價。²⁴

從這段引文來看，洪煜的「小報文化公共空間」似乎比較接近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是一個足以「對抗主流文化霸權」的權力場域。然而即便小報可以諷刺、調侃政治人物，這並不一定代表政治權威的消解；正如同 1990 年初期美國學界對「中國是否出現公共領域」的辯論，反對者最大的質疑，在於諸如報刊等「公共領域」的機制或現象，並未藉著輿論形成制衡力量，突破中國原有的權力結構；²⁵事實上，小報文人的政治幽默也不是近代才有的現象，君權至上的帝制時期，士大夫以迂迴方式消遣腐敗政治的例子比比皆是，這很可能只是惡劣環境下自我解嘲的方式，不一定是「民主自由的追求」。

如果「公共領域」或「公共空間」不完全適用於定義小報的特性，也許我們應該嘗試以小報所存在和影響所及的場域，也就是「城市」來理解其重要性。城市是孕育報刊的空間，中國最早出現近代報刊的地方，除了澳門、香港等外國傳教士群聚之地，便是廣州、上海等沿海城市。根據戈公振的統計，清末中國境內共有 179 種日報，分佈於全國各省，包括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山東、山西、河北、東北、廣東、廣西、貴州等，發行地多為該省省會或主要都市，²⁶而小報更主要集中於上海，因此小報可以說是城市的產物。另一方面，小報也是形塑城市文化的媒介，不但以城市居

²⁴ 洪煜，《近代上海小報與市民文化研究》，頁 353。

²⁵ 關於「公共領域」的辯論，見 *Modern China* 19:2 (April 1993) 的專號論文。

²⁶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頁 115-119。